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宋庆龄



宋庆龄是二十世纪一位杰出的女性；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她鞠躬尽瘁，七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献给了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因此，她赢得了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 一、童年和少女时代

1893年1月27日（农历壬辰年十二月初十），上海陕西北路369号一个传教士家庭迎来他们第二个女孩的降生。这个家庭就是后来被称作中国的四大家族（蒋、宋、孔、陈）之一的宋家，这个女孩就是后来被人们誉为“国母”、“国之瑰宝”的宋庆龄。

宋庆龄，曾用名庆琳，化名苏西、林泰，教名露瑟萝，学名罗莎蒙德（Rosamonde亦译作洛士文），日文化名中山琼英。

宋庆龄原籍广东省海南岛（今海南省）文昌县。她的父亲宋嘉树（乳名阿虎，号耀如）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牧师兼实业家，其一生曲折坎坷，极富于传奇色彩。

1866年9月，宋嘉树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一个商人家庭，是次子，本名韩教准，后来因过继给自己的堂舅为子，改名宋嘉树。1875年夏，九岁的宋嘉树便流落南洋。他和一个哥哥一起投靠在爪哇（Jawa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最重要的大岛）的一个亲戚，在那里当学徒。1878年初，宋嘉树跟随堂舅不远万里横渡太平洋去了美国东海岸城市波士顿（Boston），帮助堂舅经营丝绸茶叶铺。期间，结识了一些在美国留学的好朋友。他们纷纷劝宋嘉树去学校读书，由于堂舅的坚决反对，小嘉树暗下决心，选准机会，偷偷地跑进停泊在波士顿港口的一艘政府缉私船上。也许是船长佩服他的胆量，或是喜欢他追求独立创业、追求自由的勇气，船长不但没有处罚他，还热情地帮助他，让他在船上做杂役。之后，他随船长来到了美国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结识了当地教堂的牧师。1880年11月7日，14岁的宋嘉树接受了基督洗礼，被命名为查理·琼斯·宋（Charles Jones Soong），人们习惯称之为宋查理。1881年4月，宋嘉树进入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一年后转学到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1885年5月，宋嘉树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几经辗转，1886年1月，宋嘉树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一边传教布道一边兴办实业。特别是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结识与交往，使宋嘉树发生了一生中最大最根本的转变，很快便成为孙中山的热情支持者和挚友。

宋嘉树常常向孩子讲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曲折经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与命运抗争不怕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意志，不卑不亢谦虚自尊的精神以及对子女大胆和有远见的培养，都对宋庆龄崇高品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浙江省余姚县人，1869年出生于上海。据记载，她是我国明代著名科学家、学者徐光启（1562—1633年）的后裔。

倪桂珍从小聪明伶俐，好学上进，成绩优异，尤其擅长数学，会弹钢琴。17岁高中毕业就留校任教。她虔信宗教，热心慈善事业，积极参加教会活动。

1887年仲夏，19岁的倪桂珍与22岁的宋嘉树在上海结婚。由于他们俩的信仰、性格、志趣相投，结婚后的生活美满幸福、和谐融洽。特别是在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上，她们有共同的责任感和极其严格的要求。

宋庆龄共有姐妹兄弟六人，三男三女。大姐宋霭龄（1890—1973年），自幼聪明、坚强，后来嫁给山西巨商之子孔祥熙（1880—1967年）。妹妹宋美龄（1897年—）1927年12月和蒋介石结婚。另外还有三个弟弟宋子文（1894

—1971年)、宋子良(1899年—)、宋子安(?—1967年)。由于宋氏族中有三个不平凡的女儿,宋庆龄的父母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杰出的父母之一。

宋嘉树、倪桂珍夫妇极其重视对孩子的培养和教育,特别是把女儿作为智力上与男子平等的家庭成员来对等,在当时的中国家庭中是罕见的。因此,宋庆龄十分敬爱自己的父母,珍视和继承了父母身上许多优秀的品德。

宋庆龄的童年是幸福和愉快的。她出生以后,家境渐好,日子慢慢富裕起来。她的父亲特意在上海虹口郊区农村买地建房,自己设计,半土半洋。这个优美而简朴的环境,使得孩子们能自由地奔跑玩耍,采集花草,捕捉虫鸟,无拘无束地嬉戏。优雅、和谐的环境,民主、欢乐的气氛,陶冶了宋庆龄的志趣和情操,培养了她独特的品性:文雅善良,热爱生活。

宋庆龄从小喜欢学习,读书很用功。当天色已晚她还在读书的时候,父亲劝她休息。她则回答说:“把功课准备好,我才快活。”她喜欢思考,凡事都要动脑子。她喜欢问问题,喜欢寻根究底,随便什么问题,如果要她相信,她总要问为什么。在中西女塾读书的时候,每周三学校经常请一些名人来校主持宗教讨论会,宋庆龄每次都要向主持人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一次,她的妹妹生气地问她:“你为什么总向李牧师提问题?难道你不忠实信仰?”

宋庆龄小的时候,常常有自己的主见。有一次,她和许多同学一起上福音课。她很安静地听老师讲了圣经中的一个故事。记载说,耶稣把所剩的几个饼和几条鱼向天祝福后分给了跟随他的几千人吃了。宋庆龄听了以后马上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当时,她只有六、七岁。

宋庆龄儿时性格中,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她聪慧、含蓄、沉稳。她的情绪总是稳定的,从不慌张。她富于同情心,她的心肠很软。

有一次,她在学校里看见厨师宰鸭的情景,她就跑开了,并且为此哭了起来。从此,她在这个学校里就再也不吃鸭了。

宋庆龄很喜欢文艺。尽管她生性文静,但在文艺演出的时候却很大胆,而且演技出众,经常博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

1908年7月,15岁的宋庆龄从上海中西女塾(McTear School for Girls 马克蒂耶女子学校)毕业。不久,她带着父母嘱托,和妹妹一起依依不舍地离开上海,乘船赴美国留学。

他们首先来到了新泽西州萨米特镇的一所私立学校补习功课,准备有机会的时候报考大学。在这里,宋庆龄专心好学,兴趣广泛。她常常贪婪地阅读成年人看的小说和其他书籍,包括历史、哲学等。

1909年9月,宋庆龄终于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Wesleyan College for Women)文学系。入学后,她更加勤奋刻苦,阅读了大量的文史哲著作。同时,她也热心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她曾担任学院校刊《威斯里安》的文学编辑,又是学院文学社的通讯员,还是院戏剧俱乐部的演员。她的全面发展深得同学们的钦佩。

宋庆龄最关心的还是祖国的命运。她特别喜欢学习祖国的历史,关心中国人的幸福。她时常从爸爸的信中了解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发展情况。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宋庆龄接到了父亲寄来的象征民族联合的五色旗。她激动得满脸通红,立刻从房间的墙上把旧国旗一把扯下来,踩在脚下,高喊:“打倒龙!高举共和

国的旗帜！”这是多么炽烈的感情呵！当同学们问她为什么总是那么多地考虑国家的事情时，宋庆龄回答说：“我不能忘记中国，如果忘记了，人生就没有了意义。”

不久，宋庆龄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政论文章，题目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文章说，“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场革命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它还标志着一个皇朝的覆灭。这个皇朝的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使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家，沦为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她说：“一切苦难，如饥荒、水灾和各方面的倒行逆施，其根源都是由于清朝暴政及其贪官污吏。压迫是这场惊人的革命的起因。在清朝官吏看来是一场灾难，实际是造福于人民的一大幸事。”她称赞自己的国家说：“一个拥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定居在地球上最大版图上的民族，他们的文明如此光辉灿烂，不可能不对提高人类美德产生影响。中国是第一个拥有刑事法典的国家；她的哲学家对人类思想的发展有过最宝贵的贡献；她那丰富的文献和优良的社会伦理规范，简直是无与伦比。”“人口众多，热爱和平的中国，将作为和平的化身，站在世界的前列。”

这是多么美好的祝愿呵！这是身处异国他乡尚在求学的十几岁的少女对自己祖国表现出的最真挚的热爱呵！这字里行间，无不充满激情和力量，震撼人心。宋庆龄曾引用拿破仑的一句话来激励自己的爱国豪情，这句话就是：“中国，一旦行动起来，整个世界将为之振动。”

1908年至1913年，宋庆龄在美国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时期——青少年时代。六年里，她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成长为一个拥有事业心、日趋成熟的青年女子。日渐炽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自尊的无限激情，祖国对儿女急切的召唤，使得宋庆龄放弃了在美国继续学习的打算。1913年春，当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以后，便决定立即回国，投身到救国救民的大潮中去。

## 二、爱情、革命和理想

1913年夏，宋庆龄从美国启程，动身回国。在当时，她若要躲避国内动乱而又艰苦的生活，留恋美国优越舒适的环境，在美国找个工作并长期居住下来，是一件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也确有不少华人正迁居美国。况且，宋庆龄本来也有在美国继续学习一二年的打算。但是经过慎重的考虑，她终于还是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这是多么崇高的情怀啊！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宋庆龄第一次表现了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

最初，宋庆龄是计划从美国直接返回上海家中的，她给友人们留下的地址都是上海家里的住址。但是，在回国途中，宋庆龄接到父亲的电报，要她推迟行期并假道日本，他们在那里迎接她。宋庆龄以为也许国内局势变得严重起来，父亲及全家是特地到日本来迎接她的。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在日本一住就是两年多，而且在那里打下了她一生奋斗的基础——献身革命并与孙中山结合。

孙中山（1866—1925年），广东省香山县（现中山市）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早在1892年前后，孙中山就与宋庆龄的爸爸宋嘉树结识。他们都是广东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先后在国外接受西方教育，又都是基督教徒。更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改变祖国命运具有宏伟远大的抱负。因此，他们相识后，宋嘉树很快便成为孙中山的挚友和他的革命事业的热情支持者。他依据自己在上海宗教界和实业界的优越地位，以宗教和实业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帮助推进民主革命事业。孙中山则为了革命南来北往，国内国外，上下求索。1894年，孙中山第一次在宋家见到了宋庆龄。当时，她仅仅是个一岁多婴儿。以后，孙中山常在宋家寄居，受到宋家的尊敬和热情接待。孩子们把这位“温文尔雅”的叔叔视若“教父”一般。在宋嘉树的家人中，最认真看待宋嘉树与孙中山的交往与革命活动的是宋庆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经常思考父亲与孙中山谈论的问题。孙中山的救国理想和革命的献身精神，在宋庆龄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她听见孙中山说，中国非革命不可，我们要推翻现在的这个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我国人民有权利自己选择管辖他们的人，选择替他们制定法律的人。我们应该有一切权利，我要为这个目的而生，要为这个目的而死。听到这里，宋庆龄轻声地说：“我也要同你一样。”这一句简单的插话，使宋嘉树和孙中山深感惊奇！宋庆龄曾经说过：“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来，就忘了一切——家庭、学校等等。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我却担心着中国。”

1913年8月29日，满怀革命理想的宋庆龄在日本横滨登陆。第二天，她便怀着仰慕和崇敬的心情，在父亲和姐姐的陪同下到孙中山的寓所拜访，激动地向孙中山致意。此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处于困境，许多革命党人或意志消沉，或背叛出走，跟随在孙中山身边的同志不多。于是，宋嘉树和他的大女儿宋霭龄，二女儿宋庆龄一起频繁出入孙中山的寓所，协助孙中山工作。特别是1914年9月，宋霭龄回上海结婚离开了工作岗位，经孙中山同意，宋庆龄正式接替姐姐，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她积极地帮助孙中山工作。把诸如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经管革命经费以及许多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担负起来，每项工作都做得很出色，

逐步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上离不开的助手。1914年11月，宋庆龄在写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的信中这样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年轻的宋庆龄十分敬仰孙中山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他的坎坷经历深深地感动了她。对宋庆龄来说，孙中山不仅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而且是她家庭中一个真诚的挚友。她从小就把他看成是一个领袖，一个导师、一个学习的榜样。她常常沉湎于他所讲述的人生经历，政治理想和革命信念当中。

为中国革命四处奔波，不断遭受挫折、备受痛苦和孤寂煎熬的孙中山，也在宋庆龄的帮助和照顾中得到鼓舞和安慰。正是这一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共同理想，使她们在患难中默默相知，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宋庆龄在多年以后回忆自己的爱情抉择时曾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可见，当宋庆龄把自己的命运和孙中山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时候，首先是把个人的爱情和革命的理想结合起来，而且在她的心里，献身于中国革命的共同理想要高于两人的爱情。

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的一个私人宅院里，宋庆龄戴着大花边帽，穿着一件粉红色和淡绿花图案的裙子，手里拿着一束花，显得十分俏丽动人。孙中山和她手拉着手走进大门，来到中庭，客人们走过来，向他们表示祝贺。这就是一对战友简朴的婚礼。连宋庆龄自己也说她们的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她们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她们婚后的生活却是幸福的。宋庆龄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很愉快，我想尽量帮助我的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已大有进步，现在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直接加以翻译。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是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恼人的考试罢了。”孙中山对婚后的生活也是极为满意的，他说：“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是的，当一次次的失败和挫折降临到孙中山头上的时候，他常被人嘲笑为“空想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等等，但宋庆龄却对他表现了难得的理解和支持，她说孙中山是一个拥有不息的热诚百折不挠的人，“当时的保守派和改良派嘲称孙中山为‘孙大炮’，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鼠目寸光，缺乏勇气和信气，缺乏对永远要求进步的人民的同情。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一个革命者，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总是不知道疲倦的，总是把未来看作光明的。”这正是孙中山伟大品质的写照，他从不灰心，每次总是从挫折中汲取教训，从而探索中国问题的更深的根源。对他说来，知识要从过去和现在的行动中去获取，又用于未来的行动。

1916年4月，孙中山从日本秘密回国，5月中旬，宋庆龄也秘密回到了上海。此后，她陪同孙中山先生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负责处理大量的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这期间，她历经许多风风雨雨，亲身体会到：有许多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人正在拚命地要把中国拉进欧洲大战中去……许多

人为了钱、微不足道的一笔钱，竟然甘心牺牲国家的前途，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呵！她无不感慨地说：“我的丈夫几乎花费了他的整个青年时期为中国振奋民族精神而努力，他对某些高官自甘堕落的行为强烈反感，这些人把金钱和地位置于诸如真理、荣誉、自尊心等其他一切事物之上，他们是在贬低自己的人格。”在这些事情上，最使孙中山、宋庆龄夫妇痛心而难忘的莫过于1922年6月的广州蒙难。

1920年11月下旬，宋庆龄随同孙中山离开上海经香港回到广州。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挥师进军广西，讨伐桂系军阀，胜利之后又乘胜出师北伐，要用武力打倒北洋军阀，统一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广东军阀陈炯明于1922年6月16日凌晨在广州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竟用大炮轰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形势万分危急。在这生死关头，宋庆龄临危不惧，再三请求孙中山先走，自己坚持留下来吸引叛军注意力。她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在孙中山撤离险境后，宋庆龄一直坚守到早上八时，当叛军冲进总统府时，她才在两名卫士和一名副官的掩护下，冲破层层封锁，经过一天一夜的艰难路程，终于在17日晚到达黄埔军舰上与孙中山先生会合。

宋庆龄为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临难应变，大义凛然的英勇行为，充分体现她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强意志和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受到了革命同志和广大官兵的衷心敬仰。

1911年以前，孙中山领导和组织过大小十多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他又领导和发动了反对袁世凯、反对段祺瑞的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这一系列的革命斗争，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埋葬了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但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特别是从革命的目标和任务上看，革命并没有成功。整个中国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

在一次次斗争中，宋庆龄与孙中山先生一起分享过胜利的喜悦，也屡尝了失败的苦果，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几乎危及他们的生命，使他们陷入了深深的徬徨和苦闷之中。对此，宋庆龄深切地理解和同情孙中山先生，并热诚地同他一起总结经验教训，探寻革命的新出路。宋庆龄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曾说：“孙中山先生痛苦地认识到国民党的严重局限性，我曾多次听他说国民党内部矛盾怎样使他不能有效地进行革命。国民党中不真心想在中国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党员太多了。……怎样领导革命斗争，这是他想得越来越多的问题。”

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和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件，如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1919年5月我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孙中山顺应历史潮流，并在宋庆龄的有力帮助下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用宋庆龄的话来说，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开始觉悟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并逐步形成以俄国为师的思想：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个人能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前进是多么可贵啊！

在宋庆龄的陪同下，孙中山先生与苏俄代表维金斯基、马林、达林、越飞、鲍罗廷等人先后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和谈判。之后，孙中山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

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就是苏俄……俄国是第一个平等对待中国的强国。”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始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合作的实质性工作。1924年1月，当讨论国共合作的有关具体问题时，宋庆龄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所谓“堕落”就是指国民党员缺乏革命精神、士气与勇气，大家忘记了建立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革命，因此产生了个人利益开始支配党员行动这种不幸的后果。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先生对于周围所见的一切感到厌恶和失望，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把入党看作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因此，正是深刻地理解了这些革命道理，宋庆龄才坚定不移地维护孙中山的革命理想，维护革命的利益，时刻准备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1924年1月下旬，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今中山大学）举行。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等重要议案，选举出包括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人在内的中央委员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从而实现了国民党的改组。这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建立。在这样重大问题上，宋庆龄呕心沥血、全力以赴辅助孙中山先生，不愧是一位得力的助手。

1924年11月，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孙中山接受北京军政首领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他深知北上前途殊难预料，但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也不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宋庆龄更是义不容辞，面对重重困难，毅然陪同孙中山先生开始了艰难的长途旅行。他们于11月13日从广州出发，经过香港、上海、日本神户、天津等地，于12月31日到达北京。

孙中山毕生为革命奔走，长年艰苦工作，饱受颠沛流离生活之煎熬，他的身体早就受了严重的损害，肝胃疾病时常发作。与宋庆龄结婚以后，在宋庆龄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孙中山心情舒畅，饮食又得到精心调理健康曾一度好转，胃病几乎痊愈。但是，由于后来接连不断的南征北伐，转战前线，极度劳累，尤其是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的精神受到无比沉重的打击。他曾无不痛心地说，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在蒙难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的五十多天中，孙中山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过程中，国民党右派分子玩弄阴谋诡计，从背后破坏，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健康。有时，他甚至气愤得食不下咽，终于积劳成病。这次北上，又一路颠簸，长途跋涉，再加上沿途接见记者、发表演讲等，使孙中山先生精疲力竭。当12月4日，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乘船抵达天津大沽口、孙中山站在船头向簇拥在码头上的群众致意的时候，他的脸色就很难看，宋庆龄更显得忧心忡忡。当他们乘火车到达北京，面对数以万计的欢迎的人群，孙中山就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了。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先生还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表明了他的坦荡胸怀。

在北京，孙中山先生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道路。宋庆龄守在病榻旁日夜待候，体贴入微，经历了她一生中最为悲痛的时刻。1925年3月12日晨，一颗伟大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时候只有59岁，他和宋庆龄结婚还不满十年。

巨星殒落，举国哀悼，云凄海咽，天痛地悲。是年，宋庆龄仅32岁，对她来说，这是多么巨大的打击啊！宋庆龄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她太爱孙中山先生了。在孙中山身上她倾注了所有的爱恋和关怀。中山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让人铭心刻骨的声音：现在我要分别你们了，“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孙中山先生为革命先后奔走数十年，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不治家产，不谋私利。他遗留给宋庆龄的“一切”，就物质来说，只有两千多本书，一幢华侨捐赠的有五个房间的住宅和一些还未用完的日用品等，仅此而已。但是，在宋庆龄的心里，孙中山先生却给她留下了无比巨大而又珍贵的精神财富。她依然清晰地记得，是她热泪涔涔、难以自己地抬起先生的手腕执笔在先生已立就的遗嘱上签名：“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她依然不会忘记，先生签字后对她及周围的同志痛心地说出这样的话：死生本不足惜，但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义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我很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那么我虽然是死了，也能瞑目了。

宋庆龄陷入极度悲痛中。在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她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共担革命的重担，忘我地工作；她们也共享家庭的温馨和幸福。而现在她失去了她的丈夫、领袖、导师以及给她父亲般慈爱的人。她伤心极了。但是，每当她想起孙中山先生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时候，心里又油然生起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力量激励她继续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孙中山先生的临终遗言和遗嘱，成了宋庆龄以后几十年努力奋斗的座右铭。她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孙中山的遗志，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毫不犹豫地沿着孙中山先生指明的道路继续前进。

### 三、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4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随之，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统一和巩固。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军事、行政、财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在平息了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发动的武装叛乱以及先后两次东征沉重打击了广东军阀陈炯明后，基本上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1926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打败了北洋军阀，北伐军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宋庆龄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不愧是革命的中流砥柱。在维护革命阵营的团结、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阴谋以及揭露和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恶行径等方面，她表现了应有的气节。

早在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内部就充满了复杂的派别斗争。慑于孙中山先生的崇高威望，当时并未形成轩然大波。但是，孙中山先生病逝以后，特别是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工农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度恐慌和仇恨。他们一方面或明或暗地勾结国内外反革命势力伺机反扑，另一方面也纷纷组织形形色色的右派小集团进行组织分裂活动，诸如北京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上海的“辛亥同志俱乐部”，广东的“孙文主义学会”等等。

1925年8月20日上午，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廖仲凯夫妇在去国民党总部参加重要会议途中遭反革命暴徒枪击，以身殉国。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谢持、张继等人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要求取消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党籍，公然分裂革命阵营。

在这十分危难的时刻，宋庆龄毅然挺身而出。当获悉廖仲凯在广州被暗杀的噩耗后，她悲愤交加。廖仲凯从二十世纪初期流亡日本时开始，就一直是孙中山先生最亲密的同伴之一，他个子不高，肤色较黑，读书广博，情绪乐观，工作效率极高。他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积极拥护者和坚决执行者。他身居高位，却依然竭力加强同广大民众的相互联系。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孙中山先生遗嘱，努力工作，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他死后在广州举行了10多万人参加的追悼纪念大会。宋庆龄在给廖仲凯夫人何香凝的唁电中说：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何香凝则将“精神不死”的大横幅在葬礼结束之后挂在自家门口寄托心中的哀思。不久，宋庆龄又带病离开上海南下广州，和何香凝一起共同担负起先烈遗留的重任，并肩战斗。

1926年1月8日，宋庆龄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她站在主席台上，发出了庄严沉静而又斩钉截铁般的声音，旗帜鲜明地严厉谴责了右派集团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号召革命党人密切合作，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如果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在她和与会的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草案，重申了国民党“一大”的纲领，惩处了右派分子。她本人也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妇女部部长。

斗争是艰苦的，形势是复杂的。短暂的风平浪静之后，革命的大潮中卷

起一个又一个的漩涡。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中山舰即原永丰舰，在1922年6月对陈炯明的斗争中，孙中山曾移居该舰并以之作为指挥部，所以后来为纪念他改名“中山舰”。蒋介石玩弄阴谋，先给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发去一道命令，要中山舰移泊黄埔。然后他又宣布李之龙未经报告准许，擅调该舰，企图进攻他的黄埔总部，并诬称这是共产党和苏俄顾问的阴谋。以此为借口，他下令逮捕李之龙和几名苏俄顾问。同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员、政工人员多名也遭被捕或软禁。蒋介石还下令在广州实行戒严和宵禁。这样他便把军权一步步地集中到自己手里，达到了获取实权地位，削弱左派、反对共产党人的罪恶目的。他又继续施展两面派伎俩，下令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对苏俄顾问表示歉意，使许多人受骗。

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为进一步削弱共产党的地位，蒋介石提出《整顿党务案》，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得担任中央机关的部长，从而把共产党员排挤出国民党组织的最高层。这样，当7月4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的时候，蒋介石无可争议地成为北伐军的总司令了。

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一天，蒋介石终于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他个人独裁的“国民政府”。

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面对一系列反革命的倒行逆施，每一个革命者都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宋庆龄则坚定地站在工农大众一边，迎着反动逆流，挺身而出。4月22日，宋庆龄同何香凝以及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一起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另立中央、惨杀革命人民的叛变罪行，指出一切帝国主义的工具皆麇（qún）集于其反共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螫（máo）贼。”

在这段日子里，传来了宋美龄要嫁给蒋介石的消息。宋庆龄21岁听到后竭力反对，她试图保护宋美龄却遭其拒绝。宋庆龄又希望能得到“总算跟着革命势力走了一段路”的弟弟宋子文的支持，写信要他来武汉，劝他跟着革命走到底。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当宋子文来到武汉的时候，他却以自己的懦弱和可悲的选择来影响宋庆龄，“保护”宋庆龄。他还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信，要宋庆龄放弃武汉，回到上海去与南京政府合作。宋庆龄没有一分钟的犹豫和徘徊，她选择了坚持革命这条无比艰辛的道路，她斩钉截铁地对弟弟说：不行！如果武汉政府垮台了，我就回上海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就这样她不得不同自己的姐妹兄弟分道扬镳（bi o）了。不顾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

1927年7月，在武汉，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中央，也不顾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撕下了反革命伪装，于7月14日晚，公然召开“分共”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蒋介石、汪精卫终于合流，南京和武汉密切合作，国民党开始大肆“清党”，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

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宋庆龄就是这些不屈服者中的一个。她继续高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非凡的勇气和毅力，投身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七·一四”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表示了她对中国政治局势的鲜明立场，是她对蒋介石来信的公开答复，也是讨伐汪精卫之流叛卖革命的战斗檄（xí）文。声明说：“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这是多么有力的回答呵！

“声明”还要求与国民党右派们划清界限，要求同革命背叛者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她向世人宣告：“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的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正如时人评论的那样，孙中山去世以后，中国政局逆流滚滚，动荡混乱。在这一连串急剧挑战面前，宋庆龄成熟，明洁，镇定、坚强，有原则，有远见，有气魄，有韧力，……历久弥坚。

1927年8月，为寻找中国革命胜利途径，实现孙中山的遗愿，经过同友人的共同商讨，宋庆龄决定离开中国，去莫斯科。本来她可以安安静静地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里，她的亲属早就这样劝她。如果出国，她可以选择某个西方国家，宋家的人会非常乐意担负她的全部旅费。但是，她却选择了苏联。

在那严酷的日子里，宋庆龄默默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利诱连续不断；亲人们的左右劝说，特别是她所爱的母亲的凄惶之泪令她心碎。但是，她对自己的选择依然毫不动摇。她认为，苏联她向往的唯一地方。在那里，她可以大声宣扬三大政策，可以给那些依旧在溅满鲜血的国土上为革命奋斗的人们以鼓励和宣传。“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我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宋庆龄坚定地说。

年轻的宋庆龄依然站在捍卫孙中山先生队伍的前头。她就像一道闪电，使人惊醒，使人震动。

1927年8月23日凌晨，上海法租界一片寂静，林荫道上还是黑黝黝的。为了防止反动派的秘密监视，宋庆龄一副贫穷妇女的打扮，悄悄地离开了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她的寓所。几经周折，天亮前终于搭上了停泊在吴淞口的一艘破旧的苏联轮船。东方泛起鱼肚白时，这艘轮船缓缓地向苏联港口海参崴驶去了。

#### 四、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是它们企图征服全中国的前奏。蒋介石政府对外奉行不抵抗政策，叫嚷“攘外必先安内”。他命令东北军不予抵抗，致使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溃，东北三省迅速落入日军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很快掀起了抗日反蒋的浪潮。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宋庆龄奔母丧由法国经德国、苏联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8月18日，宋庆龄在上海参加了母亲的葬礼。之后，她惊闻蒋介石逮捕并秘密杀害了她的好友、一代英豪邓演达。宋庆龄悲愤之极，怒气冲天，当场将茶桌掀翻，指着蒋介石的脸，骂他残害忠良。特别是当蒋介石政府于12月17日血腥镇压了南京、上海、北京、济南、安徽、江苏等省市要求出兵东北收复失地到南京请愿的学生之后，宋庆龄痛心疾首，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

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军队突然袭击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以蒋光鼐将军为总指挥、蔡廷锴将军为副总指挥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广大市民的支持下，抵制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奋起反击，爆发了著名的淞沪抗战。

当时，由于在东北顺利得手，日本帝国主义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在48小时之内占领上海，三日内封锁中国。这一次他们却打错了如意算盘，他们遇到了我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

十九路军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将士们爱国情绪高涨，深知：捍卫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卫国守土而抵抗，即使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上海各界爱国群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救护队、运输队、宣传队、募捐队，从各方面支援十九路军。因此，战况异常惨烈。

在淞沪抗战期间，宋庆龄以全部精力投入支前工作中。她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亲临前线，或鼓励将士浴血奋战，或慰劳官兵奋勇杀敌。有时敌机就在上空袭击，她却镇定自若，一派巾帼大将风度。当她看到前方伤亡惨重，急等救护，官兵生活给养很差，医护更是奇缺之后，就立即同何香凝等人协商，紧张地投入为部队筹饷和建立伤兵医院的工作。她不辞辛劳，以各种形式为前线将士募捐筹款。由于工作忙碌，几乎每天在外面奔走，常忙得连午餐都顾不上吃。为支援十九路军的军需，宋庆龄几乎把自己的钱都花光了。

正是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十九路军抗击优势敌人达一个月之久，使日本侵略军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三易主帅，多次增兵，都未能越雷池一步，始终被压缩在吴淞沿海一线。宋庆龄高度赞扬了十九路军的英勇行动。她说：“十九路军卫国抗敌之忠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他们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

与此相反，自“一·二八”事变前的1931年10月起，蒋介石就不给十九路军发放军饷，武器弹药也不予补给，更有甚者，还把人民的捐款截留归“公”，欠饷在捐款中扣除，余款上缴。当日军侵犯上海后，蒋介石一方面

惊惶失措，立即迁都洛阳，另一方面在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策划下开始通过“国际联盟”与日本和谈。他顽固推行“先安内后攘外”政策，提出“宁忘九·一八，毋忘平赤祸”的口号，终于在1932年5月5日正式批准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屈辱性条件，迫使十九路军撤离了阵地。一场轰轰烈烈的浴血抗战，最后夭折了。

“一·二八”事变后的三十多个日日夜夜，宋庆龄爱国爱民不屈不挠，站在民族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十九路军官兵表现出来的爱国精神，在她的身上充分地体现出来了。一个美国记者在此期间采访了她的事迹后，万分敬佩，这样写道：“孙先生之宋夫人，德才如玉，刚强正直，爱国主勇，不畏强暴，极力宣传抗敌救国，卓有成效，举目环球，无与伦比，啊，她是一位敢死之救国女杰。”

1932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妄称东北已脱离中国，组织傀儡政权“满洲国”，1933年1月，又宣称热河省为“满洲国”领土，攻占了山海关和临榆县城。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抵抗，山海关守军全部壮烈牺牲。但国民党热河省省长汤玉麟推行不抵抗政策，致使热河省仅十天就全部沦陷。

宋庆龄得知消息后，准备北上组织妇女救护队，救护伤兵。后因工作繁忙难以分身，改派他人赴北京慰问伤兵。同年3月，她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联合上海30多个进步团体，组成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她担任会长，并发表长篇演说，第一次提出她对于中国抗战的全面主张，即四项要求：派遣全国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军队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热河、保卫中国；武装人民并组织义勇军；立即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进攻。

1934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宋庆龄、何香凝、章乃器等人发起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宋庆龄担任筹备会主席。6月20日，由宋庆龄领衔的1779位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的发起人、赞助人决定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名义在全国发表，其主要内容是：全体武装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采取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及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战费；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联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军队作友军，与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建立友谊关系。同时，还发表了对日作战宣言。这是“九·一八”事变后，继苏区民主政府和工农红军对日宣战之后，第二个代表中国人民对日宣战的宣言。宣言号召一切爱国者共同讨论和决定抗日计划与办法，宣言指出，现在已到了人人要问自己愿不愿做亡国奴的时候了，如不愿做亡国奴，只有自动起来对日作战，完全抛弃依靠政府的幻想方能自救救国——中国人民已到不战不胜的时候了。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加速了侵华步伐。5月，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梅协定》，攫取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然后，又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妄图鲸吞我华北五省和平津二市，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已到了“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生死关头，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5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学生们悲愤地指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学生们也第一次喊出了积压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呼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从而掀起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当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巨浪涌到黄浦江的时候，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立即迅速高涨。此时宋庆龄在上海。她的心和广大师生是相通的。她在详细了解了北平的运动情况之后，亲自向学生捐款作为抗日宣传之用。在上海，宋庆龄积极参与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救国救亡运动。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800余人，在上海市商会举行纪念“一·二八”四周年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30人组成理事会。同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会也在宋庆龄等的号召和组织下，在上海秘密成立，会议通过了成立宣言和救国政治纲领。11月10日救国会举行孙中山诞辰70周年纪念活动，宋庆龄发表纪念词，号召全国同胞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她说，铁和血一定可以铸成出灿烂辉煌的民族解放。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当局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的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史称“七君子”）。随后将他们移解苏州，关押在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事件发生，在宋庆龄的带动下，各方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国内外各界兴起援救“七君子”的运动。

蒋介石顽固实行内战独裁政策，也遭到国民党军队内爱国官兵的反对。12月初，爱国将领张学良只身前往洛阳会见正在那里部署“剿共”内战的蒋介石，要求他释放“七君子”。张学良甚至质问蒋介石：“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但蒋介石根本不理这一套，他一方面继续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亲临西安逼迫已与红军达成停战协定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重点“剿共”战火，进行自相残杀、亲痛仇快的内战。张、杨二人在“哭谏”未果之后，于1936年12月12日被迫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十多人，并且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救国会领袖等等。

宋庆龄得知消息后，在事变当日发表通电拥护张、杨的主张。她说，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但面对严重而又复杂的局势，宋庆龄以全民族利益为重，主张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条件厂释放蒋介石等人。她甚至不顾个人安危，邀请何香凝同在西安，以促成事变的妥善解决。中国共产党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对事变各方进行了大量很苦而又有成效的工作，终于使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蒋介石在答应了抗日条件、承诺不再内战以后被释放。以此为契机，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促进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发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寻找借口突然进攻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妄图实现征服全中国的野心。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就是“芦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事变后，日军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很快占领北平、天津。8月1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企图迅速直捣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

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发布了自卫抗战声明，宣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

侵略所逼迫，不得已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接着，先后调集 70 余万人投入淞沪抗战，华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也纷纷对日军的入侵进行抵抗。中国共产党早在 7 月 8 日就已向全国发表抗战宣言，红军迅速集中并奔赴抗日战场。

目睹全国抗战局面的出现，宋庆龄无比激动和兴奋。在一封信中，她这样说：“中华民族现在已经像一个巨人似地站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了。全国在精神、行动和意志上这样团结一致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47500 万的中国人民必然不会灭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消灭他们。”她相信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她到处作抗日演讲，撰写救亡文章，呼吁人民行动起来为抗战出钱出力。有一次，她来到上海南洋女子中学演讲，教师和学生很快就把礼堂坐得满满的。宋庆龄这天穿着十分朴素的衣衫，脸上挂着慈祥的充满胜利信心的微笑，操着十分亲切的上海地方口音，生动地向师生们介绍当时的抗日形势。她慷慨激昂，热情洋溢，号召妇女们要爱国、爱人民，为中国的抗战贡献出一份力量。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演讲中，她那种坚毅的神情和爱国热忱，深深地打动了广大师生的心。在她的鼓舞下，师生们在校内外开展了为前线抗日战士、为难民同胞的募捐活动。短短几天中，在南洋女中校长所居住的西康路一带的居民就赶做出一千多件丝棉背心，送往前线和有关救济单位。

在上海，中国军民顽强抵抗，阻击日军近 10 个师团 30 万人、50 余艘军舰、500 架飞机的进攻达三个月之久，并击毙日军将校级军官十余人，敌军伤亡五、六万人。“八·一三”抗战挫败了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整体计划。但在日寇的大量增兵和疯狂进攻面前，中国驻军

虽顽强奋战最终还是被迫撤退。1937 年 11 月中旬，上海沦陷。为了宋庆龄的安全，中共中央建议宋庆龄离开上海去香港。宋庆龄为了获得为全民抗战服务的自由，以便对祖国的解放事业做更多的工作，她决定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前往香港，而不是随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西撤。12 月下旬，在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和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李云的掩护陪同下，宋庆龄登上停泊在外滩黄浦江上的法国邮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抵港后暂居九龙，继续为祖国人民神圣的抗战事业而战斗。

为了争取更多国际友人的援助，支持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宋庆龄一到香港就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商议，准备建立一个专门组织。经过紧张筹备，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于 1938 年 6 月 14 日在香港宋庆龄寓所宣告成立，总部设在香港半山区西摩道 21 号。她动员并团结了许多知名的中外人士支持或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她还明确宣布“保卫中国同盟”的目标是：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等供应中国。可见，“保卫中国同盟”的任务就是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服务，它的口号是“帮助中国人民进行自救”。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始终把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部队和根据地视为异己力量。从 1938 年底开始，不仅大量削减甚至停发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而且还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长期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为此，宋庆龄领导“保卫中国同盟”经过种种艰苦努力，克服运输途中的道路困难和国民党的层层阻挠，把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数万名浴血抗战、热诚爱国的八路军、新四军广大官兵来说，这如同“雪中送炭”！

不仅如此，她还安排和介绍了许多外国著名医生如白求恩、米勒、柯棣华、巴苏、法莱、布朗、哈里森等前往解放区，其中有的人还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九千余人的新四军皖南部队在转移途中遭七万余名国民党部队的包围和袭击，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仅有千余人突围。事变发生后，一方面，蒋介石发布命令，掩盖事实真相，诬称新四军叛变，另一方面自知理亏，严密封锁消息，不许新闻界予以报道。周恩来不得不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愤怒而痛心地下写了这样的诗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宋庆龄知道消息后，与何香凝、柳亚子等人联名起草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的公开信，愤怒谴责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同时，又在“保卫中国同盟”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上予以详尽报道，打破了国民党的反动封锁。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和英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基地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即，日军进攻香港，12月25日，香港沦陷。在工作人员的再三要求下，宋庆龄才搭乘最后一班飞机从启德机场起飞前往重庆，当时离香港沦陷只有6小时，日军已逼近机场，飞机起飞后几分钟，机场即遭轰炸。

重庆是与香港完全不同的地方。它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被称为“陪都”，情况十分复杂。大约经过了半年多的艰难准备，“保卫中国同盟”才于1942年8月在重庆恢复。在重庆的四年里，宋庆龄以顽强不屈的精神，领导“保卫中国同盟”克服了重重困难，从各方面继续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她与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经常保持联系，多次接待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她还多次主持集会，缅怀先烈，申张正气。她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始终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署投降书。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胜利的一天。人民群众热泪盈眶，纷纷涌上街头欢庆胜利。宋庆龄也同全国人民一道沉浸在无比的激动和欢乐之中。但是在短暂的庆幸之余，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她不得不开始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抗战胜利了，中国向何处去？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也许即将到来，她又将面临新的拼搏……

## 五、为新中国而奋斗

1945年12月，宋庆龄结束了在重庆的生活，回到了阔别八年的上海。此时，她已53岁。自从她和孙中山1915年结婚起，30个春秋已经过去；自从孙中山1925年去世，她独立步入政坛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理想而奋斗也已20年了。风雨磨难，如今她已更加成熟。面对八年战争带来的严酷现实——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工业崩溃、灾荒瘟疫、失望与贫困；面对日本投降，中华民族迎来的新的转机，她无不感慨万千：这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任务，要解决和完成它们，需要我们更多的努力。

1945年12月，宋庆龄发表《保卫中国同盟声明》，宣告“保卫中国同盟”从即日起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总会暂设重庆，不久即迁往上海。她积极着手制订“中国福利基金会”中长远规划，致力于战争创伤的恢复和建设工作。全国内战爆发以后，她领导该基金会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将救济福利工作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全力支援解放区军民，为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募集，援助了大量的物力、财力。此外，她还帮助解放区开办了制药厂、医疗队。同时，“中国福利基金会”还大力救济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患病及贫困作家，专门设立了文艺救济基金，使得大批作家能够从事创作和维持生活。宋庆龄还积极从事少年儿童的福利事业，在上海创办了多个儿童福利站，为贫穷儿童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学习、文娱、生活和活动设施。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国民党不顾中共和民主人士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一意孤行，为达到国民党一党专政之目的，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终于撕毁停战协议，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悍然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战火迅速遍及全国城乡，炮火连天，生灵涂炭。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对。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要求和平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

7月23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声明，要求促成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她指出内战不能促成团结和解放，不能解决民主问题，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混乱、饥饿和破坏。她呼吁立即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她的声明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广泛的震动和反响，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运动，给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1947年以后，经过一年的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已转入全国规模的反攻，解放战争的形势已出现伟大的历史转折。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为团结自救，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决心进一步联合起来，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

在宋庆龄的支持下，1948年元旦，以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等人为首的国民党民主派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它发表宣言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宣言还表示，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前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大会推举宋庆龄为“民革”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等为主要领导人。同一天，何香凝还为《华商报》题写了“争取革命的三民主义实现，为永久的民主和平奋斗”的新年贺词。“民革”的成立对蒋介石国

民党又是沉重的打击。从此，“民革”全体同志更加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并肩战斗。

1949年1月31日，国民党驻北平守军在傅作义将军的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给宋庆龄致电希望她能早日北上，参加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不久，宋庆龄复电说明她正在就医，不能北上。但她在信中又激动地说：“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

1949年5月27日，上海这座百年来的“冒险家的乐园”终于回到人民手中。这一天，上海上空彩旗飞舞，锣鼓喧天，百万人民共庆解放。宋庆龄也高兴地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现在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了，整个民族有了光明的前途。”

7月1日，宋庆龄写了一篇热情洋溢又充满诗意的文章，表达了她三十多年来的心声，这就是《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

“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我们的完全胜利已在眼前。向人民的胜利致敬！”

……

“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

“这是胜利的高潮，荡漾到每一个口岸。各国人民运动风起云涌，把我们的力量和他们的合在一起，加强这勇敢的战斗。向全世界民主斗争中的同志致敬！”

……

“是的，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里程碑。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制度。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辉的高峰。敬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

……

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接受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再三邀请，由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告别了曾经生活、战斗过的难忘的上海，前往北平。

一提起北平，宋庆龄的感情就深深地沉浸在对孙中山先生的怀念之中。她说：“北平是我最伤心的地方，我怕到那里去。”是的，宋庆龄永远不会忘记24年前那次让她肝胆痛裂的北京之行，她的先生、她的导师、她心中永远的英雄、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就是在那次北平之行中，为赴国难，与世长辞。如今，她踏着先烈的足迹，又是为民族建国大计，奔赴北平。

8月28日，宋庆龄抵达北平。月台上站满了等待的人群，她们来自方方面面，代表着不同的团体和阶层。但是，她们又都有着共同的目的和愿望，

那就是等待这位毕生为新中国奋斗的忠诚战士的到来。当宋庆龄乘坐的列车抵达车站的时候，她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 50 余人的热烈欢迎，一群活泼可爱的少年儿童手捧鲜花投入她的怀抱，宋庆龄的脸上挂满了晶莹的泪花。

是啊！24 年前孙中山先生把他衷心的愿望遗留给后人，24 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宋庆龄无比兴奋地发表演说。她说：“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同志们、让我们现在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1949 年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下午 3 时，宋庆龄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 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宋庆龄 56 岁。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的艰苦磨炼，她已经成长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十分崇敬的伟大女性，成为全国人民拥护、爱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她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给中国共产党许多难能可贵的帮助。她有无穷智慧和力量，她温文尔雅，安详宁静，但从不居功自傲，而是欣然接受人民的重托，呕心沥血，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国务活动中去，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她经常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推心置腹，彼此关心，亲密无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

她不顾身体的劳累，经常深入基层视察，倾听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她先后走遍了祖国的四面八方。1950 年 10 月，冒着即将来临的严寒，走遍了东北三省，视察了鞍山钢铁厂、长春市郊区、黑龙江双城县农村及部队。回来的路上又去秦皇岛码头视察。1951 年 11 月，她视察华北地区，参观了张家口、大同、北戴河等地。1955 年 5、6 月间，她到了上海国营第一棉纺厂和江苏松江专区以及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儿童医院、同仁医院、市立第四妇女保健医院等地，亲自调查研究，为即将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做准备。在以后的国家建设中，她提出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和指导意义的见解，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宋庆龄还是一位人类的和平使者，她为维护世界和平，为加强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好交往，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宋庆龄喜欢鸽子。因为鸽子象征着和平和幸福。鸽子温顺、纯洁、美丽，是有灵性的好动物。在上海和北京的家里，宋庆龄饲养了不少鸽子，她亲自给它们喂食，听它们“咕咕”地叫，让它们飞落在自己的肩上、手臂上。这时的宋庆龄总是愉快的，总是慈祥地微笑着。

早在三十年代，宋庆龄就是一位勇敢的和平卫士。她到过苏联、德国、法国等地。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就去过美国，后来又跟随孙中山先生奔走日本各地。在中国黑暗的年代里，她结识和交往了许多进步的国际友人和民主人士，有的成了终生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拥有了一个保卫世界和平、加强国际交往更宽阔的舞台。她先后出访过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锡兰等国，结识和交往了许多新朋友。1950 年，她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领导成员，1952 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在国际活动中，她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了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交往，受到了中外各方人士的广泛崇敬，被国际上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宋庆龄也是一位关心妇女、儿童事业的慈祥的母亲，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热爱的祖母。

建国后，她继续为妇幼事业操劳、工作，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她重视妇女的作用，关心妇女的解放，主张男女平等，要求在法律上确保妇女的各项权利，使她们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对于新中国的儿童工作，宋庆龄强调一方面要关怀少年儿童的生长，做好儿童保健工作。另一方面，她强调更要重视儿童的教育。她说，儿童是我

们的未来，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儿童的。但是，她又认为，儿童的成长不是自发的，需要用正确的思想去教育。她说，离开了教育，即使老子是英雄，儿子也不一定会成为好汉；幼苗纵然是要生在肥沃的土地上，但如果没有农民细心的培育，不去锄草、施肥、灌水、除虫，就很难长成茂盛的庄稼。

在她的关怀下，中国福利基金会先后创办了《儿童时代》半月刊，少年宫和儿童艺术剧院等，为少年儿童的成长开创了新天地。

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她更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她曾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致词，成为唯一的在大会上发言的非共产党人士。据说，在1957年4月，她曾向当时党的领导人之一刘少奇同志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郑重讨论了她的这一要求，刘少奇和周恩来亲自去看她，转达了中央的意见，并告诉她：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会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会随时都告诉你，你都可以参加。周恩来还说，中国有千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可见，中国共产党对她的尊敬与信赖。

1957年11月，她被邀参加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这次聚会上，她会见了许多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激励她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和努力。

星移斗转、岁月沧桑。1981年5月15日，宋庆龄迎来了她一生最光荣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夙愿终于实现了。而此刻，宋庆龄正身患重病接受治疗。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为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为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光辉的业绩。为此，1981年5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1981年5月29日，我国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因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宋庆龄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决定为宋庆龄同志举行国葬，以表达我国各族人民的沉痛悼念。

5月31日至6月2日，首都各界十多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吊唁大厅，瞻仰宋庆龄的遗容，缅怀她一生革命的光辉业绩。

6月3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都万人集会隆重追悼宋庆龄。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宋庆龄同志，七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献给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

宋庆龄同志留下遗言，要求身后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埋在她父母墓的右边，把已故的伴随她五十多年的李妈（李燕娥）埋在墓的左边。

1981年6月4日，上海万国公墓庄严肃穆。整修一新的宋氏墓地，龙柏苍翠挺拔，冬青树环绕周围。上午9时50分，宋庆龄的骨灰安葬典礼开始。哀乐奏起，人们肃立默哀，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骨灰盒安然放进洁白如玉的大理石椁。一朵朵鲜花轻轻地撒在她的墓上。墓的周围放着宋庆龄生前喜爱的兰花、杜鹃花和郁金香。素净的墓碑上镌刻着：

“一八九三年——一九八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之墓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立”

